

七八十年代美国宗教新右派运动

钟 文 范

作 者 钟文范, 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七八十年代 美国宗教 新右派运动 性质

提 要 美国宗教新右派运动是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危机、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解体的产物, 对于美国选举的政治联盟重新组合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其性质的认识不能简单化。它既是保守的, 属于右翼运动的大范畴, 但又是激进的右派运动, 有别于一般的保守运动。其激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下层, 就其本质而言, 则主要是中产阶级下层群众披上“宗教复兴”外衣的激进主义的表现。把宗教信仰复兴与平民的激进政治联系起来, 并左右美国的政治格局, 这是美国政治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独特现象。

同“历史上的伟大的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着”一样, 在本世纪 70- 80年代, 美国政治钟摆从自由主义一边偏向于保守主义一边的转折时刻, 也有宗教信仰复兴变迁相伴随着。

美国是主要西方国家中宗教信仰最流行的国家, 公认的美国宗教选民的比例比任何主要西方国家都要大, 宗教势力对美国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近期崛起的宗教新右派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特别引人瞩目, 它对于美国政治联盟的重新组合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 我国学术界对此尚鲜有系统地研究。本文试对该社会运动作一初步的探讨, 这将有助于了解当代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向。

一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 美国是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国家, 然而有关政教关系的争论实际上从未停息过。特别是在近 20- 30年间, 有两个广泛发展的趋势使得美国各教派卷入政治的争纷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 教派成份的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即那些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基要主义的”或“信奉严格教义的”教派势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19世纪支配美国社会的基督新教,到世纪转换之交,由于一些神学家力图将基督教教义与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达尔文主义揉合起来,该教宗的上层便在神学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结果,1896—1900年间,基督新教的保守派在全国召开了一系列的《圣经》会议,旨在坚持《圣经》及其教义的传统观点,这是基要主义运动的发轫。这些会议中最富意义的是纽约尼加拉会议(1895),它公布了基要主义学说的五大观点:(1)《圣经》的绝对正确性;(2)耶稣基督是神灵感孕所生;(3)耶稣基督的神性;(4)耶稣代死救赎;(5)耶稣肉体的复活^①。这个新教保守派通称为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一译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既反对基督教义与现代思想一致的现代主义,也反对改革的理论。

到本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由于社会世俗化加深而陷入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许多人对传统上基于宗教观念而树立的民族、祖国、家庭、人生、社会责任与义务等观念日渐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唯我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性解放主义。这些思想的泛滥导致婚姻、家庭道德原则的瓦解,随之离婚率、非婚同居、同性恋、色情书刊、吸毒和犯罪增长。这一背景及其后果,促使新教界反思,并导致美国人不是与宗教疏远,就是皈依信奉严格教义的教派,随之宗教新右派崛起,保守的基要主义抬头。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编辑托尼·托马斯所指出,更流行的新教教派(即那些趋向于世俗主义、教义宽容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教派)迅速失去其追随者,如联合公理公会、圣公会和联合长老会等。而许多信教者则被一些教派改变为基要主义者,这些教派如南方浸礼会^②、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其信徒增势显著。70年代中期以后,基要主义复兴的势头更加明显而普遍,甚至连一般被视为基要派和福音派影响较弱的新英格兰也不例外。据1981年初的一份调查,过去的10年间,该地区建立的350—450个教会中,几乎都是福音派或基要派的教会。该地区的8000个教会中,约有一半属于基要派或福音派^③。

促使基督教徒投入政治生活的另一个发展趋势,乃是吸引有保守倾向的教徒的一系列全国性的所谓“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出现。由于当时美国的离婚率非常高,以致家庭问题足以使整个社会发生分裂,因而它成了美国公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政治战略家往往将家庭问题视为发动集中于“圣经带”^④的福音派和基要派联合起来,建立新的政治联盟的最重要手段。

在60—70年代的政治中,热烈讨论的“家庭问题”包括诸如堕胎等特殊的单一问题,以及性道德与行为问题。当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总统将结束时,宣布要召开一次白宫家庭会议,随之公众对于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兴趣便顿时倍增。次年,该计划获国会认可,其宗旨是:全部重审现代家庭的作用及联邦政府对其施加影响的方式。于是,在华盛顿约有28个组织成立了一个联盟,旨在计划召开上述会议并保证必须坚持原宗旨直到胜利。该联盟包括颇有影响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全国天主教慈善团体联合会。宗教新右派的家庭政策是:企图加强传统的家庭关系,支持双亲权威;拒绝政府可能作出决定破坏家庭的任何动议;强调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包括于家庭问题之中的堕胎问题,把各教派都吸引到政治活动中去。在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罗氏诉韦德和多伊诉博尔顿两案作出有关堕胎问题的裁决之后,许多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团体都在全国或州的范围内动员起来,企图削弱或抵制上述裁决的影响。“保卫无罪的生命”的口号,把宗教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动员起来并卷入了政治漩涡,它既促使宗教团体与潜

在的政治同盟者加强联系，又成为处理各教派与政治新右派关系的一种策略。例如，1973年以后，堕胎问题曾把罗马天主教派与新教的基要派和福音派围绕单一的政治目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宗教联盟。该联盟由20多个宗教团体和大约14个教派或教宗组成，戮力维护堕胎问题的自由选择权^⑤。

重要性仅次于堕胎问题的就是免税法令和联邦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问题。70—80年代，由于公立学校日趋世俗化及教育标准下降，而圣经教育和基督教价值观却备受欢迎，私立学校遂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在卡特政府任内，1978年国内税务署企图实行新的政策：要求所有于1953年以后创办的学校得遵守有关取消种族隔离的公共政策，否则享受慈善事业免税的法令就会对其无效。这一新政策立即引起猛烈的抵制运动，使大批浸礼会牧师与新右派的压力集团结成了政治联盟。在反对国内税务署这一举措的运动中，基要主义和保守的福音派的选民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传统道德的沦落也激起宗教新右派的热情。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认为道德的退化与没有在学校中灌输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有关。他们把美国世界地位的下降、美国力量与繁荣的衰微看作是对美国道德堕落的审判。在1980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学校祈祷问题的听证会上，基要主义运动一位重要领导人詹姆斯·罗比森强调指出，以往15年间发生的事件，尤其是水门事件和越战，是美国“集体罪过”所带来的恶果；上帝已经反对其“选民”；美国所受到的灾难是上帝对全国不遵守《圣经》信条及取消学校祈祷一举所表示的愤慨^⑥。罗比森的观点是宗教新右派思想的集中反映。抨击当代美国道德堕落所造成的恶果，是号召基督教“走出私室”、积极投入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最后，其时官方对宗教事务干预的扩大所激起的宗教基层的敌对情绪也与日俱增。干预的主要表现为：废除课堂上的祈祷及由国内税务署判定何为宗教活动或不是，等等。这种干预引起了政教双方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议。仅在联邦最高法院1980年秋开庭期间，就有2/3的案件与宗教事务有关。于是，1981年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有关政府干预宗教事务的大会，与会者代表基要主义的浸礼会教徒和克教徒，以及基督教科学派教徒等^⑦。

上述种种新问题：道德和文化上的堕落、堕胎合法化、上帝和《圣经》被逐出课堂、宗教事务受到政府的干预扩大等，激起了基要派和福音派教徒广泛的政治反叛，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

二

从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发生大骚动以来，在基要主义复兴普遍化的同时，围绕着上述诸问题，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以空前的激情渐渐地投入了政治。美国政治学家凯文·菲利普斯指出，同保守主义政治一样，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是战后基要派被卷入全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分水岭^⑧。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这是20年代以来，宗教右派首次参加总统选举政治的一次重大政治行动。4年后，美国独立党乔治·华莱士的竞选运动又在南方基要主义诸州激起不寻常的政治热情，获得了该地区大量的选票。由于基要主义选民的作用日增，到70年代初，一些政治战略家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企图把主要以南方浸礼会（基要主义者尤众）为背景的牧师与孤立的政治右派代言人联合起来，这些代言人许多都与“美国青年争取

自由”组织有联系。在1972年的大选中,南方白人基要主义者大多投尼克松的票。福音派和基要主义者给予尼克松(共和党)和麦戈文(民主党)的票的比例为1300万对300万。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1977—1981),力图把福音派和基要派的社区与政治右派的组织结合起来的工作加速进行。从事这项工作最得力的组织是:“基督教之声”、“道德多数派”、宗教圆桌会议和全国基督教联盟。

“基督教之声”(以洛杉矶为基地)由罗伯特·格兰特牧师创建于1978年。该组织是福音派教徒对70年代形势作出政治反应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它使数万牧师接受政治新右派的思想影响而参加立法机构选举的投票。到1980年,该团体已与27名国会议员取得联系^⑤。它的国会代表明显的特点就是背弃东北部而倾向于“南部边缘地区”。南部地区是传统的基要主义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基地,这股势力是该组织发动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运动的主要后盾。

基督教新右派的最大组织“道德多数派”则反映出另一种意图:企图超出福音派和基要派的社区,建立一个把新教徒、犹太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联合起来的组织。该团体由基督教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R.比林斯、理查德·维格里、保罗·韦里奇、霍华德·菲利普斯·埃德·麦卡蒂尔和杰里·福尔韦尔策划建于1979年。它是一个以基要派为核心的庞大的宗教性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把大多数新右派团体联合起来,向共和党施加压力,影响1980年的大选,以便恢复美国传统的“精干政府”、霸权地位、爱国主义、商业自由和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其纲领集中反映了美国基要主义福音派的发展趋势:以维护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名义,把政治与宗教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基督教新右派。1980年夏,该组织声称已把8500万美国人组建为一个“保护家庭、信奉圣经”的联盟。约翰·H.辛普森指出,按照“道德多数派”的社会道德纲领,约有70%的美国人可以归入“保守”的一类。即是说,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被吸引到“道德多数派”的立场^⑥。这个基督教新右派的最大组织成为罗纳德的·里根竞选和施政期间的主要政治盟友之一。

另一个把宗教右派与政治右派联合起来的组织就是宗教圆桌会议。其建立的基础模式与“道德多数派”略有不同。它由E.麦卡蒂尔创建,其宗旨是:为各种立愿要为特定的道德问题而斗争的团体提供一个大联合的形式。由于麦卡蒂尔与“保守派核心会议”的密切关系及其与福音派宗教界的长期联系,该组织一开始就把来自广泛的跨地区的宗教领导人和有中右倾向的压力集团代表联合起来。美国政治学家吉利恩·皮尔指出,该组织使数千万保守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对国会考虑影响堕胎、私立学校、学校祈祷和庞大的防务诸问题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⑦。

上述宗教团体都反对三种发展趋势:流产的合法化、色情文学的传播及对同性恋的宽容。它们戮力而奋斗的是:给公立学校祈祷、读经;取消“平等权利修正案”;挫败被认为帮助和唆使道德败坏的自由派国会议员。宗教新右派认为这三种发展趋势使美国正陷入可怕的道德堕落的深渊,而国家德风败坏又会导致美国的衰落。为了改良世风,重振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拯救美国,他们发动了两大运动:“净化美国运动”和“保卫家庭运动”。

到80年代末,估计全美约有7500万趋向保守的基督教徒被发动起来了。这时宗教右派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他们的目标不再限于捍卫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而是把宗教复兴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致力于把支持宗教右翼纲领的候选人选入政府部门中去。同时,宗教界与政界的右派进一步联合起来,作好了争取右派保守主义的多数胜利的准备。

罗纳德·里根在 1980 年和 1984 年的竞选获胜，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得力于其与基督教新右派的公开联盟。里根为了迎合选民的宗教情绪，竭力表白自己是“再生基督教徒”，并出席 1980 年“宗教圆桌会议”的达拉斯宗教集会，表示支持宗教右派所提出的某些要求。于是，在 1980 年里根的竞选运动中，基督教新右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政治激情。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提高里根的声誉，大树其在基督教徒心目中的“救主”形象，宣扬他是“重建美国的有力工具”。宗教新右派各团体的努力，为里根上台奠定了基础。里根在 1980 年的竞选获胜，显示了宗教新右派运动的力量。估计白人基要主义者投里根的票数占里根多过卡特得票数的 10 个百分点的 $\frac{2}{3}$ 。^⑥

为了报答宗教右派的支持，并继续保持合作关系，里根政府任命了好几名新右派教会人士为白宫高级官员。如右派首领维格里的助手莫顿·布莱克韦尔任宗教事务顾问、反堕胎运动领导人 C. E. 丘伯为卫生福利部部长助理、上帝会的詹姆斯·瓦特任内政部部长、“道路多数派”董事 R. 比林斯任教育部的高级官员。里根政府还采取一系列迎合宗教右派愿望的政策，如撤销一项执行了 13 年之久的否认种族主义私立学校免税权的政策。同年，里根总统又公开支持一项允许在公立学校祈祷的宪法修正案及向私立学校提供信贷的立法。

从里根在达拉斯宗教会议上发表竞选演说之后，美国社会掀起了一个呼吁“结束政教分离”的右翼运动，建议用《圣经》信条来检验美国的立法，使基督教新右派的政治热情在里根总统任内达到了高潮。

在 1984 年大选来临之时，里根试图蝉联总统，遂决定同宗教右派再携手合作，将联盟公开化，并采取了两项投合宗教右派的措施：（1）批准了得克萨斯州新右派电子布道家 J. 罗比森的求职申请；（2）任命福音派牧师蒂姆·拉海叶为共和党的联络官，负责发动、组织福音派选民的投票。于是，拉海叶同基督教新右派领导人进行周密的策划。他领导的美国传统价值同盟得到电子牧师们的大力襄助及南方浸礼会领导人查尔斯·斯坦利、上帝会会长托马斯·齐默尔曼的得力支持，成为里根竞选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宗教后盾。拉海叶企图以此作为同里根的交换条件，以达到其最终目标：使基督教徒在政府雇员及全国居民中的比例相当，均达到 88%。据《纽约时报》统计，在 1984 年的大选中，美国 59% 的选民和 81% 的“白人再生基督教徒”投了里根的票^⑦。因此，美国时论认为，1984 年里根的连任，同 1980 年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均得力于基督教新右派的政治支持。可以说，在里根总统任内，基督教右派运动达到了战后时期的高潮，迎来了他们的所谓“黄金时期”。此期间，美国基督教界的参政意识不断提高，且政教之间形成了难解难分的伙伴关系。

三

关于这次宗教复兴运动的性质，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是一次宗教右派（或保守）运动。然而，实际上问题并非那样简单。笔者认为，这是一次极其复杂的社会运动，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其性质和特点，必须注意到 60 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变形。在此期间，美国的整个意识形态结构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在从政府的政策到文化、道德诸方面都更加“自由主义化”之时，许多对现状不满或反对现状的人，都自认其思想倾向是“保守主义的”。因此，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国一切可能激进化的力量多麇集在“保守主义”旗帜之下。美国

社会学家西蒙·M. 利普塞利把这时右派势力的壮大与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的解体联系起来。他认为, 社会解体导致一大批人流入右派运动。人们处于异化、颓丧、失范的境地^①。因此, 这时意识形态中保守主义一翼似乎发生了变形, 保守主义日益具有对税收、自由派的官僚机构、各种规章、司法裁决及当局所批准的针对社会问题的措施产生恶感的大众的乃至平民主义的特色。

鉴于上述新变化, 笔者认为 70—80 年代的宗教复兴运动具有双重性。就其维护传统的宗教、道德和家庭的价值观念来说, 它是保守的, 属于右翼运动这个大范畴。然而, 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主张的, 他把激进的右派运动这种“假右派”同一般的保守运动区别开来^②。他认为保守运动通过贬低变革的意义来维护长期存在的制度和价值观念, 而激进右派则制订右翼方针, 剧烈地变革现状^③。笔者认为, 此宗教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激进的右派运动。

这个社会运动激进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群众。保守的基要主义宗教团体的成员及其同情者约有数千万, 主要分布于美国南部和中西部, 他们与中产阶级激进派往往是重迭的, 两者构成“新右派”的群众基础。G. 亨德里克斯指出, “基要主义宗教团体正变得拥有大批的中产阶级分子。”^④ 社会学家唐纳德·I. 沃伦认为, 中产阶级激进派大约由 23% 的美国人组成, 他们是中产阶级下层群众^⑤。评论家 K. P. 菲利普斯也指出, “道德多数派”和宗教圆桌会议及其同盟者所发动的选民都具有同样的气质, 按其登记和传统文化, 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下层^⑥。他把当时新右派的成员(含宗教新右派)称为“平民主义的保守派”^⑦。

由于美国不存在欧洲那种地主贵族和国教, 所以美国缺乏“欧洲式”的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对比之下, 在美国, 一种非贵族式的、非教条式的“保守主义”常常反映出中产阶级的情绪, 故而, 它并非经常是“保守的”, 而也可能是激进的。在 70—80 年代的宗教右派看来, 当自由派富人控制了一切, 没有理由去接受现状, 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厌恶的现状, 除非靠多数人采取政治行动。宗教新右派的重要领导人韦里奇就如此表白过: “我们是要求改变现存权力结构的激进派。保守主义意味着接受现状, 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不是保守主义者, 我们不能接受现状……新右派并不要保守, 我们要改革——我们是改革的力量。如果人们厌恶这个国家的一切, 那么他们就期待着保守主义的领导人去作出那种改革。”^⑧ “教牧运动”的发起人鲍勃·韦纳也声称, 《圣经》上说, 教士们将统治世界, 所以他们应成为教育的主宰、国家的元首、众参议员和报纸的编辑等, 总之, 他们应占领一切生活领域^⑨。可见, 宗教新右派并不承认现存的权力体制, 而是雄心勃勃地企图主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 就企图靠普通人采取政治行动去改变自由派现存权力体制这个意义上来说, 宗教新右派社会运动是激进的。L. 梅德卡尔夫和 K. 多比尔认为, 这个运动“同时是激进的、多数主义的、中产阶级下层的和保守主义的, 这在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是完全没有先例的”^⑩, 此观点可以说是了解该时期美国基督教新右派运动特征和性质的一把钥匙。

从上述可见, 就其本质而言, 该运动主要是中产阶级下层激进主义的表现。然而, 这种激进主义又是披上“宗教复兴”外衣的, 是中产阶级下层基要主义者一次大规模激进化的表现。正当这个宗教信仰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美国许多评论家和学者就密切地注意到这点, 认为这是一次新的宗教“大觉醒”。如 W. G. 麦克洛克林教授在《复兴、觉醒和改革》(1978) 一书中指出, 6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事态表明, 出现了宗教的“第四次大觉醒”。

为什么这个以普通人为基础的运动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对美国新右派的思想家和政治战略家来说，在这样一个信教人数和宗教选民众多的国度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最重要的自然就是宗教。因为教会长期所激发的美国人的宗教热情，使选民较易接受那些使用宗教信条的政治说教。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风暴（指社会运动——引者），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外衣出现。”^②

这种把宗教信仰复兴与普通人的政治联系起来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并对美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第一次“大觉醒”（约 1730—1760 年）中，越来越多的信徒背离国家教会，宽容异己之风尚得以发扬，同时宗教的民主化促进了民主热情，为美国独立运动做好了精神准备。第二次“大觉醒”（1800—1830 年）再次强调普通人，否定宗教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为“杰克逊民主”提供了一种道德构架。第三次“大觉醒”始于 19 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即衰。它再次把新教信仰复兴与普通人的政治结合起来。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信仰复兴运动。W. 布赖恩集中体现了农村民主主义的政治。与农村联系较少的人则把这次“大觉醒”的思想作为反对达尔文主义和工业家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不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期的一次“大觉醒”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演，而是在新的背景下和基础上的再现。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 T. 托马斯所指出的，这是“旧时代的宗教在新时代的崛起”^③。K. P. 菲利普斯也指出，它“不仅是一种具有旧时新教宗教意识的大觉醒，而且也产生了一种以‘新政治’措词表达的大觉醒”^④。

因此可以说，这次宗教新右派运动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而是把宗教信仰和活动与社会政治问题和行动结合起来。以下事实集中反映了这种趋势。70 年代中期，有 40 多位著名的新福音派神学家改变了对社会问题原有的冷漠立场，发表了《芝加哥福音派社会宣言》，号召本派信徒采取积极态度，代表穷人和被压迫者说话。许多神学家都在《波士顿意见书》中批评一些教会把活动局限于“拯救灵魂”的宗教范畴，回避社会政治问题的消极态度^⑤。J. K. 哈顿和 C. E. 斯旺指出，宗教新右派的领导人“不再满足于与劳乌姊妹和吉姆兄弟一道寻找上帝并得到再生。虽然拯救仍然是他们的目标，但罪人不再是你和我了，而是美国”^⑥。因此，这时的宗教新右派比 50—60 年代的宗教老右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不仅不局限于“拯救灵魂”，也不只从事反共的“单一问题”，而是把宗教信仰复兴与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道德危机、战争与和平、社会贫困、劳动与就业、民主人权等）结合起来，即要求教会不要回避尘世问题，而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然而，必须指出，这个运动的纲领中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含有保守的成份，甚至还有反动的成份。例如，在运动的领导上层所制订的“道德多数派”的纲领中，有一条所谓“神圣制度原则”就公开鼓吹“反共产主义”、恢复美国昔日的霸主地位。此外，1968 年福尔韦尔还组织了一个“自由同盟”，其纲领更突出了美国的防务和外交政策问题。他除了重弹“共产主义威胁”的老调之外，还公开表示同情被推翻的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⑦。这些都反映出该运动的领导层反动的非道德的一面。

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70—80 年代美国地震般的党派忠诚的转变是伴随着宗教或半宗教复兴力量的冲击波而发生的。这次宗教信仰复兴运动并非是一次单纯的宗教运动，它的性质具有两重性，本质上是一次以中产阶级下层群众基要主义者为社会基础、大规模的激进右派运动。美国的宗教复兴运动过去是，今后还有可能是周期性地出现并对美国政治形态产生重

大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美国政治史上值得注意的一种独特现象

注 释:

- ① 罗纳德·L. 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 宗教社会学》(Religion in Society: A Sociology of Religion), 新泽西州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 1983年版, 第 204—205页。
- ② 南方浸礼会是美国新教主流宗派之一。战后, 其信徒增长之快及发展持续时间之长均为美国各新教团体之最。至 1989年, 信徒达 1472万人, 教会 37238个, 成为遍及全美的最大的新教教会团体。80年代, 该团体已基本上为保守派所控制, 在神学上具有基要主义色彩。
- ③ 新英格兰福音派协会:《新英格兰的大觉醒》(Great Reawakening in New England), 载波士顿《环球》(Globe)杂志, 1981年 7月 26日。福音派和基要派是指基督新教内部在神学上持保守态度, 信奉严格教义的教派。基要主义是福音派的亚种, 或称为福音主义右翼。
- ④ 指美国严格信奉《圣经》的地区, 范围包括美国中部和南部诸州, 大部分为农村, 居民多为基要派和福音派信徒。
- ⑤⑥⑨ ⑪ 吉利恩·皮尔:《复兴与反动: 当代美国右派》(Ri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3 100 109—110 115—116页。
- ⑦⑧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凯文·P. 菲利普斯:《保守派在美国上台之后: 危机时代的人们、政治和思想》(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 纽约伦多姆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185 186 191 183 48 195 191页。
- ⑩ 转引自 R. L. 约翰斯通的前引书, 第 120页。
- ⑬ ㉒ 转引自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40 353页。
- ⑭ ⑯ 转引自克拉伦斯·罗:《当代美国反向运动和保守运动》(中译), 载《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 8期。
- ⑮ 美国学者一般认为, 右翼运动包括 3个组成部分: 极端右翼运动、保守运动和激进右派运动。
- ⑯ 唐纳德·I. 沃伦:《激进的中心: 美国中产阶级与反向的政治》(The Radical Center: Middl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Alienation), 印第安纳州诺特里达姆大学出版社 1976年版, 第 10页。
- ㉑ 理查德·A. 维格里:《我们新右派准备负起领导责任》(The New Right We're Ready to Lead), 弗吉尼亚州维格里公司 1981年版, 第 59—60页。
- ㉒ 琳达·梅德卡夫、肯尼迪·多比尔:《新政治: 80年代的美国政治思想》(Neo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80s), 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166页。
- ㉓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251页。
- ㉔ 托尼·托马斯:《在新时代宗教的背后》(Behind That New Time Religion), 载《华盛顿邮报》1980年 5月 4日, 第 1页。
- ㉕ 杰弗里·哈登、查尔斯·斯旺:《早期的布道士》(The Early Preachers), 马萨诸塞州阿迪森·韦斯勒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6页。
- ㉖ 查尔斯·利皮:《20世纪美国大众宗教的缔造者》(Twentieth Century Shapers of American Popular Religion), 格林伍德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37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